

南寧文史資料

南寧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88

总第五辑

南宁文史资料

1988(1)

总第五辑

24.64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3月

目 录

桂系史料

- 桂系与救国会的关系……………陈大文 (1)
记抗战期间广西省政府西迁……………苏乐民 (11)
乐群社沿革……………谢落生遗稿 (15)

教育之窗

- 雷沛鸿先生创设西江学院始末……………梁上燕 (21)
简述南宁教育事业的劫后复原……………滕肇文 (29)

工商经济

- 南宁经纪行的兴衰及其内幕……………谭 津 (31)
抗战前的南宁银钱业……………黄 锐 (48)
南宁解放前市面使用的硬币和外币……………雷 成 (56)
抗战胜利后的南宁直接税收……………黄方东 (69)
南宁自来水厂的最初扩建……………梁泽森 (74)
解放前南宁典当业简介……………黄河清 (78)

邕城话旧

- 南宁旧城街道及主要设施.....谢振铎 (79)
半纪沧桑话邕城.....罗明昆 (84)
我在南宁复办大洪山的经过.....何崇校 (91)
南宁名胜——青秀山.....激 流 (110)
新华街今昔.....温松生 (113)
南宁解放路.....邕 叟 (114)

戏剧文化

- 那莲古戏台与当地戏剧活动.....春 曦 (116)
记南宁建设书店.....梁万柱 (120)
艺人简介：花倩红.....崔志光 (125)

作者、编者、读者：

- 雷沛鸿夫人谈雷沛鸿生日.....编 者 (127)
关于南宁大事记的补充订正（五则）.....郑重宝 (129)
谢震侯并未抓捕梁烈亚.....谢 源 (133)

桂系与救国会的关系

陈大文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随着日寇侵略得寸进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上海文化界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等二百八十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并于12月27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救亡团体也纷纷成立。1936年1月28日，各救亡团体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妇女界也相继成立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二十多个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宣言、章程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并选出宋庆龄、何香凝等四十余人作为执行委员。

在各地地方实力派中，桂系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的关系颇为密切。

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取得各方面对桂系的支持，1935年10月就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国民党左派）以赴青岛养病为名，在上海作长时间逗留（住医院），

借以与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联系。李任仁赴上海时，白崇禧曾专函问候被蒋介石逮捕判刑的上海著名文化界进步人士、救国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杜重远。（注1）

杜重远，吉林省人，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常务理事。他积极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后，他继而创办《新生》周刊，自任该刊的发行人兼总编辑。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发表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日本驻沪总领事指责此文“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当局屈从日方意旨，立即下令封闭《新生》周刊，并逮捕杜重远，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白崇禧专函慰问这位救国运动的著名人物，其用意在表示桂系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破坏。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颠倒黑白，严词厉色，诬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受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赤色汉奸利用，反对中央，颠覆政府。对此，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进行了严正的申辩和控诉。桂系的《南宁民国日报》于1936年2月21日以最显著的版面，醒目的标题，全文刊登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辩正书，并揭露了南京政府压制救国运动的行径。《桂林日报》、《梧州日报》对于北平、天津、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常有报道，对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人如章乃器、马相伯、陶行知、邹韬奋等鼓吹抗日救国的文章多予转载。

救国会的领导者们并没有被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人身迫害所吓倒，仍勇敢沉着地号召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

动，并分头派人积极地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冯玉祥、熊学良、杨虎城、李宗仁、白崇禧等，敦促他们逼蒋抗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趁准备出席1936年8月初在英国召开世界教育会议第七届大会之机，提前于4月下旬离开上海，前来广东、广西从事争取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陶行知到达广州时，李宗仁即邀请他来广西观光和讲演，并与陶行知一道离开广州。5月6日抵达梧州时，李宗仁陪陶行知到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设在梧州）对全校师生讲演抗日救国问题。5月8日陶行知在李宗仁陪同下到南宁，受到高级官员白崇禧、黄旭初、以及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陶行知从5月10日到19日共作了16次讲演，听众达万人以上。5月11日白崇禧陪同前往南宁军校讲演，讲题为《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陶行知揭露了南京政府年来丧权辱国，畏难苟安，压迫学生，不准抗日的情形。讲毕，白崇禧当即起立表示：“非常同情于上海及平津各地受恶势力压迫摧残的学生青年，并深信民众力量的伟大，认为时势所趋，潮流所向，将来定能扩大，普遍完成我们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16日，李宗仁亲自陪同陶行知于上午6时半到南宁初中大操场，向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四千余人讲演，9时半又到省政府大礼堂，向党政军公务人员两千多人讲演（两次讲演题目皆为《中国的出路》）。同日下午5时，出席由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主持的广西各学术机关的宴会，马君武致欢迎词，陶行知致答词后，在场的李宗仁表示愿与各救国会密切合作，共同负起抗日救国的使命，以争取中国之自由平等。（注2）

从上面的事实看来，救国会和广西当局是互相尊重的。

是友好的。

李任仁在上海逗留了较长的时间，与救国会的领导人有较多的接触。据救国会核心人物胡愈之（秘密党员）说：

“李任仁是最早代表广西参加救国会的（大约是1935或1936年）。在广西参加救国会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劭先，陈此生”（注3）。据1936年6月15日《南宁民国日报》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结果，个人方面，桂省李任仁、马君武二先生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团体方面桂省学联会代表章毅当选为执委。

李任仁5月中旬由上海回到南宁。他被选为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当系救国会的领导人在他离开上海前和他商定的。马君武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活动家，他被选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当系陶行知5月中旬在南宁征得他的同意而后安排的。章毅是由李任仁介绍给陶行知，再由陶行知介绍去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的。（注4）李任仁、马君武、章毅和桂系当局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他们具有半官方的身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立即下令取缔，宣布为非法团体，而广西当局却把李任仁、马君武、章毅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的事在报上公开发表出来，这是广西当局有意显示他们与救国会是有密切关系的，是积极参加和支持抗日救国运动的。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和纲领指出，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的共同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而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呼吁“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抗敌政

权，并给人民以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以推动抗日局面的开展”。桂系的喉舌《南宁民国日报》于1936年6月13日全文刊登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6月17日全文刊登了救国会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1936年5月中旬，两广实力派精神领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逝世，蒋介石趁机策划攫取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乃先发制人，借抗日之名，实行反蒋。他们大造抗日舆论，博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36年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令第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6月2日，西南执行部又以“冬”电致南京中央，请准予陈济棠、李宗仁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陈、李所部部分途向湖南出兵。此即所谓两广事变，广西习称为“六一”运动。当时日寇增兵华北，建立冀东傀儡政权，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两广当局高举抗日旗帜，不问其动机如何，对于推动抗日运动有其积极意义，因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36年8月10日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信曾提及“最近西南诸领袖通电抗日，我们又宣布愿意和他们密切合作。”（注5）

1936年6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省会南宁举行的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中，作了《抗日救国》的长篇讲话，其中说到“虽然过去国内不幸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少的裂痕，但是现在整个国家民族已经走到了死亡的尖端了，过去的一切旧账，应该一笔勾销，今后中国人不应该再打中国人，重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一致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拼命。”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到处

张贴的北上抗日布告中，还声明“不分畛域党派，欢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一切民众抗日力量加入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阵线”。这些抗日主张和救国会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6月9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李宗仁，警告他们“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蒋介石还指使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通电，指责两广当局“在国家整个计划之外，单独行动，于敌无损，徒启国家分裂之祸”。胡适和天津《大公报》也为蒋介石帮腔，说西南反对中央，挑起内战，中了日本的奸计；说西南有日本军械，是勾结日本的佐证，主张下令讨伐。

救国会对西南的抗日主张表示拥护，对蒋介石集团及其帮腔者对西南的种种攻击，予以驳斥。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救亡情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于西南事件的认识和态度》（注6）的文章，首先指出：“西南当局的表示，是‘一二·九’以来民众救亡运动的直接效果。半年来抗日战士的奔走呼号，我们的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国一大实力派的公开赞同。西南当局接受了我们民众抗日救国的要求，请求中央政府领导抗日，否则西南则首先对日作战……西南军队改名为抗日救国军，举行了郑重的宣誓，这种表示，这种措施，是一切抗日救亡的民众所拥护的。……我们应该承认西南当局是有相当诚意的。”并表示“我们希望中央和西南不致冲突，而要合力抗日，我们吁请各实力派停止一切内战，立刻进行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共御外侮，吁请中央和地方当局不要压迫民众的抗日运动。如广西当局之准许民众有组织之权利，开放民众运动，便是一例。”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读上海各大学

校长电》，文章指出当前半壁河山已入敌手，对于日寇继续侵略的形势，不能熟视无睹。再引述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在日本各报发表对华态度的言论，公然表示中国必须投降于日本，公然宣言中日关系已经达到了谈不到互相提携的境地。然后质问说：“我们深信诸位教育家是决不愿意中国亡于日本的，那末除了立刻对日抗战外，有什么其他‘整个计划’可言？是否现在的残酷侵略还不够严重，要等到整个国家亡了才是抗日的时期呢？这是我们惶惑不解，希望诸先生斥诚赐教的。”章乃器（救国领袖之一）也写了一篇文章《谁是内战之挑拨者》（注7）驳斥了胡适和《大公报》的言论。

在舆论上，救国会两广实力派特别是桂系集团是帮了忙的。当然，这种帮助是以“抗日第一”为前提的。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逃离广州。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增加抗日反蒋的政治资本，积极欢迎并邀请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到南宁来。对救国会方面，桂系先有电给驻沪代表陈铭先，要他邀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来桂。救国会方面认为沈老不宜赴桂，就决定派曾任广西师专校长的杨东莼前来南宁。杨东莼大约是八月下旬到达广西的。那时桂系邀请救国会派代表到南宁来，据白崇禧的高参刘斐说有两层用意：一、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桂系的政治资本；二、知道救国会受中共领导的，想从救国会代表方面知道中共对抗日和反蒋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调动了十几万大军包围广西，迫李、白就范。蒋介石认为不易在三个月内用军事手段解决广西问题，李、白自知势孤力薄，亦难以打败蒋军，双方都有谋和的意向。杨东莼之来，正是和谈已开始秘密进行的时候。李、白知道救国会反对一切内战的，所以对杨此次来广西极为重视。杨

到南宁的第二天，就由李、白接到当时的总司令部去谈话，杨谈了救国会的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同时表示反对广西府反蒋。李、白觉得杨的话很有道理（其实是对解脱李、白当时的困难处境很有用处）。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又约杨到总部谈话，这两次谈话，李、白、黄旭初等都在座。第二次谈话出席的还有廖磊、夏威等高级将领。第三次谈话，人更多一些，出席的有邱昌渭、王公度及各厅长等政治方面的人士。杨以责任所在，就都把头一次同李、白谈过的话说了一遍。杨的谈话，也即是救国会的主张，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听者心悦诚服。邕武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后来之转变为亲共将军，主要是受到杨东莼那次讲话的影响。

杨东莼到南宁后的第五天，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各党派各团体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鄂公（胡鄂公来南宁的情况见本刊1987年第三辑陈大文：《抗战前桂系与共产党的关系》一文），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蔡廷锴、张文、邓龙光、李任仁等约六七十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在三小时的会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言的是胡鄂公、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等人。他们一致强调要立即组织抗日政府，意见可以说一边倒。他们已内定李济深当主席，胡鄂公任秘书长，彭泽湘也安排了一个什么名义。当将散会的时候，白崇禧站起来说：“还是听听救国会意见，请杨东莼先生谈谈罢！”杨随即谈了约半个小时，内容同以前和李、白谈的完全相同。白崇禧没等别人发言，就向李济深说：“好罢！既然如此，关于开府的问题，还是从长计议罢！”这时，李济深也只好说：“以后再谈罢！”就宣布

散会。

1936年9月初两广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

杨东莼于1932至1934年间任广西师专校长，1934年春，白崇禧发现著名共产党人朱克靖化名朱笃一在广西师专任教，便把朱礼送出境。杨东莼的辞职报告还未送出，省政府已下通知：“杨东莼校长辞职照准。”这次杨东莼回上海，白崇禧送给一大笔超额旅费，含有酬谢之意。（注8）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并将他们解往苏州关押。广西学生救国会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省学生救国会共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竭力营救。并致电沈钧儒等，声援他们斗争。广西国民党机关报《桂林日报》（此时省会已迁桂林）全文刊登了广西学生救国会的呼吁书和致沈钧儒等的慰问电。

西安事变时，李宗仁、白崇禧除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主张外，还发出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张、杨的八项要求中，有一条是释放上海救国领袖）中央应予接受，而张、杨亦应先行释放蒋介石。（注9）

抗日战争开始后，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他任用救国会领袖人物之一的章乃器为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武汉、广州沦陷后，来到桂林的救国会著名人物如沈钧儒、胡愈之、杨东莼、夏衍、千家驹等都被安排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该会由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当时救国会（以沈钧儒为代表）与广西建设研究会合股创办桂林文化供应社（注10），出版了进步刊物和大

量的进步书籍。夏衍任社长的《救亡日报》（救国会办的报纸），迁至桂林出版。杨东莼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黄旭初为校长）。胡愈之凭借广西建设研究会，以桂林文化供应社为依托，开展了文化界的抗日救国活动。抗日战争初期，桂系与救国会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在桂林的知名救国会人士和其他进步人士一道被迫离开广西，前往香港。章乃器在此以前，已离开安徽省政府。

注释：

1、白崇禧致杜重远信及杜的复信均载于1936年2月7日《南宁民国日报》。

2 陶行知访问南宁情况见本刊1987年第二辑所载陈大文：《陶行知访问南宁记事》一文。

3、见《广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所载胡愈之：《回忆李任仁先生》

4、见注3同书所载章毅：《李任仁老师革命史实片断》

5、该信没有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引自毛泽东《论团结御侮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书》（载1936年11月在梧州出版的《民族战线第二卷2、3期）

6、该文转载于1936年6月20日《南宁民国日报》

7、该文转载于1936年6月20日《南宁民国日报》

8、杨东莼来广西的详细情况见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载全国政协1960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9、见龙泽应：《西安事变时桂系的态度》（载《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10、同注3

记抗日期间广西省政府西迁

苏 乐 民

日寇第二次侵犯广西，分桂南桂北两路来侵，其范围比第一次辽阔，广西半壁河山沦陷了。

在日寇大举从湖南入侵广西之前，当局即已作了桂林城区保卫战的准备，守城司令韦云淞，师长阚维雍，连同各特种兵，只有一师多的兵力保卫桂林。1944年8月初旬，省府便动员疏散，而群众徘徊观望，疏散者寥寥无几，至8月中旬强迫疏散令下，群众才仓惶逃难，省府亦开始疏散。那时敌寇由桂北来犯，桂林战局日益紧张，省府所属各机关暨桂林绥靖主任公署、广西省参议会等便乘火车向柳州疏散。桂林到柳州的一天路程却费时十二三天之久，由柳州到宜山也需时七八天，总计由桂林到宜山需时二十天左右。那时，为了备好桂林守城军队所需的生活物资，由省府民政厅负责采购粮食油盐豆米等。可是采购所得的粮食，在敌人未围城时就已发霉。第四战区司令长张发奎闻知，非常震怒，追究责任，要扣留民政厅长朱朝森和民厅负责采购的第三科长黄正杰，并说要杀他们的头。朱朝森惶恐万状，到柳州时便离职潜逃。省主席黄旭初已于桂林疏散时飞往成都养病，此时上级派陈良佐任民政厅长并代省主席，在宜山就职主持省政。当时为适应战时需要，把桂林、柳州、南宁三个警察局改编为警察大队，并组成为警察总队，任莫其才为总队长。省府迁

到宜山稍为整顿后，9月中旬继续经都安向百色西迁。

从宜山经都安到百色这条路，无火车乘搭，汽车又少，除装运公物外，只有极少数人乘汽车，其余的都是步行。代主席陈良佐领先，秘书长苏希洵殿后。队伍由宜山过廷蒙经北山过拉列到都安，又由都安经那马过贡川到果德上田东达百色。大家拖男带女、担的担、扛的扛、爬山越岭，艰苦地长途跋涉，到达百色时没有一个人脚板不起大泡。1944年10月18日，广西省府西迁抵达百色。至此，大家才面带笑容地吐了一口气。惟因百色地盘狭窄，居住困难，仍依照原定计划，一部份职员及眷属向凌云、乐业方面疏散。

在宜山至百色途中，省府队伍过了都安不久，16集团军副总司令周祖晃来到都安，立足刚定，就被日本浪人（其实是日寇特务和汉奸的合流）袭击，周祖晃脚部也被枪打伤。同时135师部也被浪人袭击，纵火焚烧，师长颜僧武仓忙逃出，因师部大印来不及拿走，颜僧武又冒着烟火冲入取回大印，眉发都被烧焦了（颜僧武与我是同村，这段事是他到百色时对我说的）。135师是奉命保卫周祖晃的，此次颜僧武保帅不力，致使周祖晃带花，周非常震怒。这时候，由于邓龙光（邓龙光是广东部队，第×集团军总司令）军队在田东、田阳一带堵住日寇前进，战局才暂时稳定下来，民心稍为安定了，因而也就不大急于向凌云、乐业疏散，百色各机关向阳圩、剥隘方面疏散的船货也待回头了。此次省府疏散到百色，沿途虽受惊于敌机空袭警报，但幸无空袭轰炸，亦无土匪劫掠，安然抵达目的地百色，诚属幸事。

这次迁到百色的机关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广西省政府、桂林绥靖主任公署、广西省参议会、广西军管区司令

部、军事委员会军风纪视察团第二团、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广西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美军广西指挥部、中美合作所……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坐镇百色指挥，百色便成为广西临时的省会，沦陷区和非沦陷区的地方军政领导人纷纷来到百色汇报情况，百色这个小小山城，突然间风云际会，盛极一时。

桂林中央银行迁到百色时，借百色广西银行停放金银和国币。住了几天，中央银行黄经理忽然把金银国币装上汽车，趁黄昏时偷偷开驶逃往旧州。我当时任百色警察局长，知道了此事马上走报张发奎，他不白我说完便站起来拍台说：“得了！马上去追返来！”当即令其警卫团长曾杰派连长一员、士兵十多人和我乘汽车去追，我们追到田西县罗里镇，便见中央银行的卡车在那里停住。当寻见了黄经理夫妇，我就把张发奎的手令给他看了，他们只好乖乖地随我们开车驶回百色。驶到长官部见张发奎时，张厉声大骂黄经理说：“黄经理，你擅自把银纸偷运走，各机关经费怎么办？你想要我的命是吗？我要你的头！现在我告诉你，今后你中央银行的行动，要得我批准，否则我就杀你的头！你听到吗？”黄吓得面呈紫色，连声“是是”。张然后说：“夜深了，你们返回去休息吧”。我和黄经理回到广西银行卸了货，已是夜半二时许了。

有一天，在百色的广西大学校友二十多人集合在百色警察局里，请白鹏飞（广西大学前任校长）来讲活，他讲完话后，大家还座谈很久。在座谈中，白鹏飞为此次军政党机关的西迁的狼狽情景撰一首对联如下：